

侯传文 著

跨文化视野中的 东方文学传统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侯传文 著

跨文化视野中的 东方文学传统

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
本书为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规划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 / 侯传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5162 - 4

I. ①跨… II. ①侯… III. ①文学研究 - 东方国家 IV. ①I3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972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53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东方文学	(1)
一 “东方文学”的建构与解构	(1)
二 总体研究与比较研究	(3)
三 大东方文学与中外比较	(6)
四 东方大文学与科际整合	(8)

上篇 文类研究

第一章 东方神话	(17)
一 东方神话现象	(17)
二 东方神话体系	(22)
三 神话与东方文化	(26)
四 神话与东方文学	(30)

第二章 东方抒情诗	(36)
一 起源	(38)
二 发展	(50)
三 类型	(61)
1. 宗教抒情诗	(62)
2. 爱情诗	(65)
3. 自然诗	(68)
4. 哲理诗	(73)
5. 社会政治诗	(77)
四 特点	(80)

第三章 东方史诗	(84)
一 史诗现象	(84)
二 文类特征	(88)
三 民族精神	(91)
四 东方意蕴	(95)
第四章 东方戏剧	(101)
一 起源与发展	(101)
二 表演性	(107)
三 抒情性	(110)
四 和谐美	(113)
第五章 东方小说	(117)
一 产生和发展	(117)
二 文体条件	(122)
三 故事基因	(125)
四 历史叙事	(128)
五 说唱底蕴	(131)
六 抒情话语	(134)
第六章 东方诗学	(138)
一 东方诗学的界定	(138)
二 东方诗学研究的意义	(141)
三 东方诗学的多元性	(145)
四 东方诗学的统一性	(148)

下篇 现象阐释

第一章 古代东方文学的多元性与统一性	(155)
一 多元性的文化根源	(155)
二 统一性的社会基础	(159)
三 东方文学的“真”	(161)
四 东方文学的“善”	(164)

五 东方文学的“美”	(166)
 第二章 中古东方文学及其文化底蕴	(169)
一 文化背景	(170)
二 思想蕴含	(173)
三 艺术表现	(176)
 第三章 文化演进与近古东方文学嬗变	(180)
一 思想反叛浪潮	(181)
二 文学语言嬗变	(186)
三 文学内容与体式嬗变	(192)
 第四章 父系文化中的妇女形象	(197)
一 妇女形象	(197)
二 父系文化	(202)
三 东方现象	(206)
四 民族差异	(209)
五 性格之美	(212)
六 人性之美	(214)
七 品格之美	(215)
八 女性美问题	(218)
 第五章 《高丽藏》与中韩文化交流	(220)
一 《高丽藏》的形成	(220)
二 《高丽藏》的特点和影响	(222)
三 《高丽藏》的文化交流意义	(224)
 主要参考书目	(228)

绪 论

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东方文学

作为一门学科，东方文学既是外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东方学”的组成部分，与比较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我国，东方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于20世纪50年代。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东方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困惑和争议，时至今日，其学科地位、性质特点、内涵外延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达成共识。有些问题在学科内部，随着学科的发展而逐渐解决；有些问题必须走出学科，才能获得更清晰的认识。比较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外部视角。

一 “东方文学”的建构与解构

东方文学是在东方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一门学科，其中“东方”这一术语的含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我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在学术界和一般知识界都是如此。历史上，我们曾经称印度和阿拉伯为西方，日本为东方（或东洋），“郑和下西洋”去的就是阿拉伯和非洲。这是以我们中国为中心的地理方位概念。后来“东方”一度成为政治概念，指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的划分也有地理因素，主要来自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格局，东欧大多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大多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东方”概念也影响到学术界，如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其“东方”就包括了俄罗斯、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①。作为一门学问的“东方学”的“东方”是一个文化概念，是相对于以古希腊

^①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传统的欧美而言的亚洲和北非，其中也有地理因素，即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地理方位概念。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来命名一个学科，似乎不伦不类。有学者声称：“‘东方’概念的本真意义存在于它的不确定的流动状态中，存在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和互融的过程中。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促使旧有的文化版图走向崩溃，并消解‘东方’和‘西方’这对陈旧的概念。”^① 在他们看来，东方概念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说明“东方文学”不具有实在性，也就是不存在一个总体性的、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东方文学。

作为外国文学分支的“东方文学”是与西方文学相对而言的。与西方文学的一脉相传不同，东方文学具有多元性。一般认为东方主要有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为中心以儒道文化为传统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以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为传统的南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为中心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传统的西亚北非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社会构成和文化特质，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由于三大文化圈在地缘、传承和文化思想方面的独立性，形成东方文化与文学鲜明的地区性，即不同地区的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审美情趣方面都表现出很大差异。将如此具有深刻差异性的文学纳入一个体系，建构一个学科，是勉为其难的事情。许多学者甚至学生都质疑“东方文学”概念，认为只有印度、日本、阿拉伯、波斯等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国别文学之上是世界文学、总体文学，不存在一个中间状态的“东方文学”。如果说在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还有中间层的话，这个中间层应该是与文化圈相对应的东亚文学、南亚文学、西亚北非文学等地区文学。这种地区文学就像欧洲文学那样，属于一个文化体系，有紧密的联系，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如果说东亚和南亚地区由于佛教的沟通还有整合的基础，那么西亚北非地区与东亚和南亚的联系，还不如与欧洲的联系密切，缺乏整合的基础。为何非要建构一个相对于西方文学的“东方文学”呢？

实际上，作为文化和文学概念的“东方”（Orient）是一个舶来品，来自西方的“东方学”（Orientalism）。以东方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东方学是18世纪在西方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东方文学”（Oriental litera-

^① 王钦峰：《论“东方”概念的流动性——关于东方文学学科基础相关问题的思考》，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ture)就是这个“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社会文化发展走在了东方的前面,西方人居高临下看东方,所以在他们所使用的“东方”(Oriental)术语中往往含有贬义,以至于有学者主张不用“东方”这一术语,而将“东方文学”改称为“亚非文学”,相应地将西方文学称为“欧美文学”。然而由于约定俗成,在学术界,“东方文学”还是比“亚非文学”名称更为流行。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西方的东方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一些问题。阿拉伯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在其后殖民主义理论代表作《东方学》一书中,以大量文学文本资料论证了“东方”作为西方权力结构支配下的概念所具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认为西方学者运用话语权虚构了一个野蛮、愚昧、丑陋、落后的东方象形,从而为西方对东方的入侵和殖民统治进行辩护^①。这样的后殖民批评通过对西方的“东方学”的解构,颠覆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东—西方”二分结构,促成了“东—西方消解论”的产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西方消解论”在西方和中国思想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西方学者甚至对欧洲、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仍然继续使用东—西方这一术语”,感到迷惑不解^②。这样的“东—西方消解论”事实上从理论架构上抽空了以“东—西”二分法划分文化的基础,也就是说,以东方和西方为划分标准的文学、哲学、美学和文化,都成了不具有实在性的“空中楼阁”。由于东方文学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这样的对东方学的解构,也给东方文学研究带来了困惑。

以上对东方文学的质疑虽然不足以动摇东方文学的学科基础,但都有一定道理,说明东方文学研究的确存在学科理论上的薄弱环节,存在总体研究困乏的学术偏颇。

二 总体研究与比较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主要分为国别文学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两个层面,东方文学也不例外。与西方文学学科相比,东方文学的国别研究虽然也显得薄弱和不平衡,但相比之下,东方文学总体研究更为薄弱。上述关于东方文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谢少波、王逢振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学学科的质疑主要是总体研究方面的问题。从学理上说,东方文学学科的合理性关键是东方文学的统一性问题。我们认为,东方文学的统一性的基础是东方文化的统一性,而东方文化统一性的基础是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一致性。在文化统一性的基础上,东方文学在真善美的追求方面表现出一些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特色。作为外在表现,古代东方文学在文体文类、主题母题等方面具有相通性,近现代东方文学在文学思潮方面具有相通性。这样的总体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文学研究,包括了跨国的研究,即不同国别文学的比较;跨文化的研究,即不同文化圈文学的比较;跨学科的研究,即文学与社会、政治、宗教、哲学、伦理等相关学科关系的研究。

总体文学研究与国别文学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东方文学总体研究应该是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但又必须超越国别文学,对东方文学的性质、特点、成就、意义进行总体概括。东方文学界的老一代学者如季羨林、朱维之等,既是国别文学研究的专家,又是总体文学研究的大师。作为东方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他们在对学科进行顶层设计时,对东方文学的内涵、外延、性质、特点、成就、意义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如季羨林先生在1982年为“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教师讲习班”作了题为《必须加强对东方文学的研究》的报告,强调了东方文学及东方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对东方文学的内涵、范围和特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季先生提出了东方三大文化圈的观点,指出:“中古时期,东方形成三大文化圈: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二是以印度为中心的文化圈;三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文化圈。”^①后来季先生又主编了《简明东方文学史》,在《绪论》中他对“东方文学的范围”、“东方文学的特点——内容和发展规律”进行了专题研究和深入探讨^②。这些概括不仅对东方文学学科具有奠基意义,而且对东方的国别文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几代学者的努力,东方文学研究特别是国别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有条件进一步对东方文学进行总体性的整合研究。这样的总体研究是东方文学内部的系统整

① 季羨林:《必须加强对东方文学的研究》,见陶德臻主编《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后来该文以《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为题在《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再次刊发。

② 季羨林主编:《简明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合。所谓内部系统整合,就是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发现东方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点和差异性。东方文学就是在东方各民族文学的比较中建构起来的一个学科,因此,没有系统整合,就没有东方文学学科的存在,同样,没有进一步的系统整合,东方文学学科也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从总体文学与国别文学关系的角度看,东方文学总体研究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研究。东方文学总体研究包括主题研究、文类研究、思潮流派研究、诗学研究等,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

以东方古代戏剧文类研究为例,首先要梳理东方各国、各民族戏剧起源与发展的情况,对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然后进行比较整合,发现一些共同规律和普遍特点。如在起源方面,东方比较成熟的戏剧并非直接源于某种宗教仪式,而是与宫廷或民间的娱乐活动关系密切,因而缺乏“严肃”的仪式基础,更加重视戏剧的表演性;在形式方面,注重表演程式;在内容方面,重抒情和表现;在审美方面,注重和谐。再如东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首先要梳理浪漫主义在东方各国发生与发展的情况,发现浪漫主义在东方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在对代表性的流派和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东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总结其文学史地位。这些都离不开比较文学的思路和方法。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东方文学总体研究不仅要以东方的国别文学研究为基础,而且要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第一,东方文学是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的,每当总结探讨东方文学的特点和规律时,总是将西方文学作为潜在的比较对象。如上述关于东方戏剧起源的非宗教性是相对于西方古希腊戏剧的宗教起源而言,其非“严肃”是相对于古希腊悲剧的“严肃”而言,其重表演是相对于西方戏剧的重情节而言,其重和谐是相对于西方戏剧的重崇高而言,如此等等。

第二,东西方文学都是开放的文学体系,历史上有着互相影响和交流。特别是近百年来,西方文学的发展走在了东方前面,在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等方面都领时代潮流,东方文学中相应的思潮、理论和方法往往是在西方影响之下产生的,既有与西方同类文学现象相同的一面,体现了世界文学的共同潮流;又表现出不同特色,体现了世界文学的多姿多彩。如东方浪漫主义是在西方浪漫主义影响之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思潮,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东方浪漫主义既表现了与西方同类文学思潮的一致性,在表现

理想、追求唯美、崇尚自然等方面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共同本质；又在民族性、神秘性、感伤性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的自身特点。可见，如果没有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不可能进行东方文学的总体研究。

第三，近百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这些理论和批评方法不仅适用于西方文学，也同样适用于东方文学。不仅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具有普适性，一些后起的各具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也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适用于东方文学研究。如提倡文本细读的新批评、关注女性问题的女权主义、注重文学探源的原型批评、关注东西方关系的后殖民批评等。有些文学批评方法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却特别适用于东方文学研究。如生态批评的出发点是面对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对以征服自然为特质的工业文明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理念提出质疑和批判，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这与传统东方智慧非常契合。前现代的东方文学虽然没有明确的环境和生态意识，但却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和人与自我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原生态智慧，值得进行深入挖掘。用西方理论阐发东方文学现象，属于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如果说单向阐发容易出现用东方作品验证西方理论的偏颇，那么，西方理论与东方文学的双向阐发，既有助于挖掘东方文学中长期被湮没被忽略的因素，又可以用东方智慧来丰富文学批评理论，使之东方化，有助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本身的深化和发展。

第四，从学科的角度说，东方文学研究比西方文学研究起步晚，学科基础薄弱，需要借助西方文学研究的成果，通过比较加深对东方文学的认识。

三 大东方文学与中外比较

在国内学术界，不仅东方文学的内涵存在争议，关于东方文学学科的空间外延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东方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最近，笔者与几位师友合作进行国家重大课题“东方文化史”研究，在课题论证过程中，是否将中国文化纳入，成为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以至于编写大纲几易其稿。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纳入东方文化史，甚至应该作为主要的立足点和参照系；有的学者主张将中国文化排除在外，理由是中国文化有专门的学科进行研究，而且国

内坊间已经有许多“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文明史”一类的成果，在“东方文化史”中再论述中国文化似乎多余。最终讨论结果是没有将中国文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但在概论部分仍将中国文化纳入视野，进行总体观照。

这种分歧在文学研究领域尤为明显。从学理上说，东方文学应该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学，然而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却一直比较含混，有的以东方指代中国，将东方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代名词；有的将东方文学作为外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而将中国文学排除在外。一般情况下，搞中国文学研究的，不管外国文学；搞外国文学研究的，不管中国文学，对概念、术语和范畴的使用也各行其是，这是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一个弊端。现有东方文学史教材基本上都对对中国文学避而不谈，东方文学不包括中国文学，几乎成为共识。

关于东方文学学科的空间外延，笔者一直坚持大东方文学观。所谓“大东方文学”就是将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总体研究，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东方文学不应该是国别文学或地区文学的简单组合，而应该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否则就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的理由；二是东方文学应该包括中国文学。中国地处东方，而且是东方大国，是东方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东方文学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理应将中国文学纳入研究范围。一个西方学者研究西方文化与文学，一般不会把自己民族国家排除在外，同理，东方文化应该包括中国文化，东方文学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对东方文学进行整体性和总体性的比较研究。

这样的大东方文学观体现了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天然联系，这就是中外文学的比较。特别是东方文学的总体研究，必须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大东方文学整体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东方文学文体、思潮等文学现象时，都应该将中国文学纳入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对东方文学史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特点和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探讨。以东方小说文类研究为例，从印度的故事及源于故事的小说，到中国的志怪传奇，再到日本的物语，有一个东方小说文体发展的历时性序列，而且在文学史上出现了印度小说早生又早衰、中国小说早熟而晚成，日本小说后发而先至等值得关注的现象，从中可以发现小说文体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可以研究小说与故事的关系、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小说与说唱的关系、小说产生发展与创作群体的关系、与接受群体的关系、与语言载体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如果将中国文

学排除在外,就不可能进行东方小说文体的总体研究。再如研究东方文学母题,无论是主要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伤春怀秋母题,还是在南亚和东亚普遍存在的轮回转生母题,都离不开对中国文学的观照。研究近现代东方文学思潮,从启蒙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到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再到现代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不谈中国文学,这些东方文学思潮的普遍规律和总体特点便无从谈起。

中国是东方大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无论是对外影响,还是接受影响,主要还是在东方。不仅是东方文学总体研究需要将中国文学纳入视野,东方国别文学研究也离不开对中国文学的观照。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中国与东方各国文学的比较是一个丰富的宝库,有待进一步开发,这正是东方文学学者的用武之地。东方文学学者树立大东方文学观念,将中国文学纳入视野,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扩大东方文学学科的影响力。因为这样的“大东方文学”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东方文学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通过多元对话和多方参照,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学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基于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亲缘关系,“大东方文学”所内含的中外文学比较,正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重要标志。

四 东方大文学与科际整合

东方文学研究不仅要有“大东方文学”意识,而且应该走“东方大文学”研究之路。所谓大文学是与纯文学相对而言的。纯文学一直是我们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功不可没。然而,不可否认,纯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着局限性,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呼吁超越纯文学的大文学研究。

第一,大文学具有元文学的意义。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的本义都是大文学,即文史哲的互涵互动。这与人类文学历史的发展实际是相符合的,因为在古代文学发生阶段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纯文学,当然也不会有相应的语言表述和概念表达。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有着元文学的意义。在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中,知情意三者是统一的,所谓“人学”就是人的知情意的表现。将哲学、历史作为求知的表现,将文学(诗)作为情感的表现,将伦理和法律作为意志的表现,这种划分在人类的认识史

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在知识专业化的时代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这样的划分又有很大的为人因素,并非完全合理的,因为人的知情意三者并非互相隔离,而是互相贯通的,作为人性的三个要素并非分别表现,而是融为一体,集中表现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知识划分过细的弊端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综合的时代重新来临。人性是文学的常量,文学的深度和广度都是靠人性的标准来衡量的。知情意是人性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而又不可分割的。单纯从情感出发的文学观念已经显得非常狭隘了,树立知情意统一的大文学观念,是人类元文学观念的回归,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我们提出元文学观念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复原,不是回到文学史的起点,而是一种螺旋式发展,是否定之否定。

第二,文学观念的扩展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诗歌是最早成熟的纯文学文体,所以在东西方古代都是以“诗”表示纯文学概念。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国孔子的“诗学”,印度的“诗庄严论”等,都是狭义的纯文学的理论。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也由最初的“诗”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甚至电影、电视剧和新兴的超文本的网络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文学是元文学的自然发展,是逻辑的必然。无论是文学史上,还是现实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都有超越狭义文学或纯文学的大文学观念存在。在文学是语言艺术这样一个共识之下,各种文体的文章都可以纳入文学的范畴。哲理的思索、历史的探寻、社会的组织、日常的应用、人际的交往,无不追求美的语言表现,从而体现出文学意识和文学精神。文学成为一个最具有包容性的意识形态,文史哲神在这儿获得了统一。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授予纯文学的作家,而且授予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这样的大文学观念的体现。

第三,大文学观念必然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文学就是由文学向文化渗透。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即使狭义的精神文化也包括了价值观念、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领域。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文化指的是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并列的文化事业。现代社会,经济中心和传播媒介的发达,传统的纯文学被边缘化,这已经成为无可奈何的事实。纯文学的研究也进入了象牙塔,与社会的相关程度越来越低,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也越来越微弱。纯文学的路越走越窄,与此相反,走出纯文学的大文学

研究却大有作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体现大文学观念的文化,能够与政治和经济形成互动关系,成为并驾齐驱的带动社会前进的三驾马车。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我们曾经展望过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即将成为现实。在这样的东方文化复兴的时代,重新发掘、阐释、传播和弘扬东方文化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在当今文明冲突愈演愈烈的时代,在全球化和本土化既矛盾对立又互相推进的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成为时代的主题。纯文学的研究显然无法承担起这样的时代重任,因此从文学进入文化是时代的要求,时代呼唤东方大文学研究。当然,大文学不是泛文学,更不是泛文化,因而不是简单地从文学走向文化,而是以文化阐释文学,以文学解读文化,文学仍然是其立足点和最终归宿。

第四,大文学观念是文学性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大文学研究体现了文史哲互涵互动的学术思想,要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进行社会的研究、思想的分析和文化的探源溯流,这些都是韦勒克等人所反对的“外部研究”,或非文学性的研究。韦勒克是英美新批评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新批评主张文本细读,认为文本是自足的本体,其内部的结构、语言、张力、冲突、悖论等,足以显示文本的意义,至于作家生平、主题思想、时代历史等,统统属于非文学性的外部研究。新批评的这些观点是一些反对大文学研究的学者的主要依据。然而英美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倾向早已受到批评,西方文学理论也早已超越了新批评,建立在新批评理论之上的文学性观念也理应受到质疑。大文学研究的基础仍然是文学性,但我们认为文学性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学文本、文学话语中不能没有社会文化的内涵。我们需要纯文学的内部研究,需要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同时主张从内部走向外部。文学研究从内部走向外部,这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大趋势。文学研究的多元语境和多重题域,不是对文学性及其审美特质的消解,而是文学性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揭示;其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走向,也不是对文学性的削弱,而是对文学内涵和研究领域的拓展。而且,我们认为,文学研究不能没有文学性,但文学性不是其终极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文学是人学,是人性的表现,是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精神家园。因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是文学的根本目的,而不应为文学而文学。在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诸多关系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文学不能不有更多的外部关怀和指涉。

我们之所以主张超越纯文学的大文学研究,主要是基于东方文学的实

际。东方文学史是大文学的历史。上古东方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源头，它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多民族创造性的智慧，以人类童年的奇幻异想，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大文学作品。上古文化具有浑然一体的特性，此时产生的典籍作为人类文化元典，都具有文史哲统一的特点，各种文化元素都在其中孕育和发展，既开出文学的花朵，又生出哲学和历史的智慧，还包含法律和伦理的规范。古埃及的《亡灵书》、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印度的《吠陀》、古希伯来的《圣经·旧约》、古波斯的《阿维斯塔》等，都属于人类文明史上的文化元典，是各民族文化深沉厚积的结果。它们都是宗教的经典，又是各民族文学史上的经典，都具有文学、宗教、哲学、史学、民俗、伦理、法律等混合圆融的特点。如果说它们是文史哲统一，那么这个统一体就是宗教。其后的印度两大史诗、佛典、往世书等，同样蓄积了久远深厚的文化内容，作为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这些经典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在文学的表现形式和表述方式方面，而且在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作品都属于典型的大文学文本，是东方大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虽然中古时期纯文学已经成为东方文学的主流，但文史哲和宗教互涵互动的大文学现象依然存在。第一，中古时期，东方各国的宗教发展成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有非常丰富的宗教文学现象，如南亚地区的印度教虔敬文学，西亚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教苏非文学等，而且宗教对一般文学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二，一些后起民族的文化元典仍然是具有大文学性质的文本，如阿拉伯的《古兰经》、日本的《古事记》等，作为文学作品，它们也都具有综合性，包含丰富的宗教、民俗、神话、哲学、史学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大文学特征。第三，中古时期东方各国民间文学比较发达，有些国家甚至以民间文学作品作为民族文学的代表作，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平家物语》等。民间文学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体现了深厚的民族特性，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第四，作家创作有许多是取材于上古的神话和史诗，延续了上古文学的大文学性质，如印度迦梨陀娑的叙事诗和戏剧、波斯菲尔多希的《王书》等。第五，一些纯文学的文本中也体现出深厚的文化精神。如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本身是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但蕴蓄着深厚的日本民族文化精神，同时与中国和印度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